

# 女性主义的空间探索与阶级意识<sup>\*</sup>

## ——论《玛丽·巴顿》中盖斯盖尔夫人的政治想象

范一亭

**内容提要** 以盖斯盖尔夫人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早中期小说家（尤其女性小说家）大多描述了女性对公共空间的探索，女性在工业城市空间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身体解放和政治能动性，于是女性主义的性别意识同空间政治融合在小说之中。本文以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为出发点，细致梳理出工业小说《玛丽·巴顿》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空间以及玛丽·巴顿所代表的女性主义空间探索。——正是在这样的工业城市空间中，她才得以完成阶级意识的转化，并以无产阶级代言人的身份实现了盖斯盖尔夫人关于无产阶级整体性救赎的政治想象。

**关键词** 工业城市空间 阶级意识 政治想象 盖斯盖尔 《玛丽·巴顿》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5.01.006

当代美国学者玛丽·蒲维在研究19世纪英国文化发展进程时曾断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乃是空间的重组以及空间内身体的重组。”<sup>①</sup>维多利亚文学研究界一直关注在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的“英伦现状”（Condition of England）的历史语境下以《玛丽·巴顿》（*Mary Barton*, 1848）为代表的维多利亚中期工业小说或社会问题小说。<sup>②</sup>研究焦点之一就是女性如何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挣脱家庭空间或私有空间（domestic space），从而通过职业、慈善等劳动实践走向公共空间（public space）。<sup>③</sup>以盖斯盖尔夫人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早中期的小说家（尤其女性小说家）大多有意识地描述了女性对公共空间的探索，女性在工业与城市空间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身体解放和政治能动性（politi-

cal agency），于是女性主义的性别意识同空间政治融合在小说之中。对上述二元空间中的女性角色的现代转换，学界多从阶级、社会性别、人物心理甚至种族等层面上加以分析；<sup>④</sup>另一方面，从列弗斐尔（Henri Lefebvre）到哈维（David Harvey），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迅猛发展，哈维在其作品中经常引用狄更斯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来印证他的马克思主义空间与资本理论。笔者认为，正确吸收和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新成就对进一步研究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阶级与性别的关系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本文从哈维的空间理论出发，细致梳理出工业小说《玛丽·巴顿》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空间以及玛丽·巴顿所代表的女性主义空间探索——她正是在这样的工业城市空间中完成了阶级意识的转化，并以无产阶级代

<sup>\*</sup> 本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世纪英国文学文化思想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YJCZH041。

言人的身份实现了盖斯盖尔夫人关于无产阶级整体性救赎的政治想象。

## 一、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与女性主义的空间消费

在讨论哈维的空间理论之前，有必要了解这一事实——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独立的消费主体，她们所消费的对象不仅包括商品，而且可以在广义上扩大到城市的空间消费。18 世纪文化将女性定义为“商品的购买者、消费交易的中介者”，甚至她们自身也是商品。<sup>⑤</sup>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体逐渐与文化和家庭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传统相互结合，市场和资本的渗透必然导致现代个人消费主义的兴起——“消费者成为一种‘表征’，因其代表了人类主体性一种理想化、程序化的模式，也是人类共通个性的特征。”<sup>⑥</sup>与 18 世纪家庭内作为商品购买者的女性不同，19 世纪的女性“消费者”以其广泛的抽象本质转化为将资本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政治经济主体。<sup>⑦</sup>女性由此成为“重新定义了个体”，内含了经济能动性，而狄更斯、盖斯盖尔的小说代表了“新兴的消费经济影响之下的维多利亚小说作品”。<sup>⑧</sup>因此这样的经济基础使得 19 世纪的维多利亚女性有可能进入之前毫无可能接触到的，专属男性的市场和商业公共领域，从而走出了昔日女性要么是局陷在家庭空间内的主妇，要么是游荡在夜晚街道上的妓女的困境。小说中的女性不仅消费城市空间和公共空间，更是开始成为工厂主、投资人、慈善家和劳资纠纷的调停人。这种具有民主与平等化能量的资本主义精神赋予女性的政治能动性可以从哈维所论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体系”中找到各种对应的空间消费行为，即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如下表所示：

|      | 物质空间<br>(经验化的空间)         | 空间的再现<br>(概念化的空间) | 再现的空间<br>(生活化的空间)   |
|------|--------------------------|-------------------|---------------------|
| 绝对空间 | 具体的劳动过程                  | 使用价值和具体的劳动        | 异化；对地方、阶级、身份等方面的忠诚  |
| 相对空间 | 商品、能量、劳动力、金钱、信贷或资本的流通与流动 | 交换价值              | 金钱和商品拜物教            |
| 相关空间 | 抵抗运动；革命精神                | 金钱价值              | 资本主义霸权；无产阶级意识；乌托邦梦想 |

( 本表根据哈维空间体系的核心要素构成 )<sup>⑨</sup>

因此，在女性性别活动 ( feminine labor ) 方面，资本一方面有积极、民主、解放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在全球征服空间，必然会和父权制度相互妥协、共谋，也就必然会对维多利亚女性的性别活动产生福柯所谓的“规训”效果。另一位空间理论家德塞托 ( de Certeau ) 在福柯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战略”和“战术”的概念——“战略”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指向诸如“商业、军队、城市、科学机构”等权力主体对“各种权力关系的积累 ( 或操纵 ) ”；“战术”则意味着个体可以在缺少权力空间的境遇中利用“战略”空间当中必然存在的“机遇”、“裂缝”来进行抗争。<sup>⑩</sup>即使在权力机构“全景式”的空间监控下，资本主义的个体依然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的“谈话、阅读、行走、购物、做饭”等“战术”手段实现以弱抗强。<sup>⑪</sup>因此，维多利亚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消费主体便可以利用一系列德塞托式的“战术”实现对公共空间的消费。笔者认为盖斯盖尔夫人代表作的女主人公玛丽·巴顿正是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公共空间来对抗父权，从而在商业、政治和法律的公共空间中部分地创造了属于女性性别的“历史” ( her-story ) 。

## 二、工业城市空间里的阶级与性别

如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言，在 19 世纪的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新生活最为剧烈变化的形式”，城市也成为“工业世界中最为醒目的外在象征”。<sup>⑫</sup>马克思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sup>⑬</sup>而以《玛丽·巴顿》为代表的维多利亚中期的工业小说便再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的社会冲突，并在社会变革和个体能动性之间谋求平衡。<sup>⑭</sup>在工厂主少爷小卡逊遭到谋杀，嫌疑人杰姆·威尔逊随后被警察逮捕之前，《玛丽·巴顿》的前半部分对 19 世纪早中期英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背景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女主人公玛丽生活在充满冲突的劳资世界里，面对的是金钱和商品、工厂和消费、工人阶级的贫穷和宪章运动对资本家的抵抗。曼彻斯特是维多利亚中叶英伦北部的头号工业城市，因此这个绝对的物质空间代表着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其小说《康因比》(Coningsby, 1844)里所提到的“劳动的伟大都市”。<sup>⑮</sup>盖斯盖尔的小说试图协调阶级、性别和地域冲突，从而弥合劳资间的阶级鸿沟，而所在的这个新兴的城市中心给“女作家和女活动家们”提供了“探索和考察的陌生又多元的社会空间”。<sup>⑯</sup>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是逐步的城市化进程，巴顿父女、乔治·威尔逊以及爱丝忒姨母等一干工人阶级群众必须直面和体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成功的自我复制”。<sup>⑰</sup>曼彻斯特这座城市逐步扩张，街道、房屋、沟壑以及各种现代交通枢纽都带动了剧烈的社会变革，由此，“工业城市的兴起标志着资本的流通渗透进入了生产和消费的核心环节”。<sup>⑱</sup>结果，街道和大厦就成为了资本主义扩张和消费的中心视觉象征。<sup>⑲</sup>小说里的街道率先体现了城市空间

外表的众多层面，“许多没有修建完成的小巷”很容易令人迷路，<sup>⑳</sup>夹杂着肮脏的水沟，构成了一路通向巴顿家居住的院子的标准化城市空间的风景。后来玛丽被卡逊少爷引至“一条许多房子还没有建筑完成的街道上去”，附近的人行道用木板竖起围墙，“用来隐蔽和挡住那些瓦砾木片之类的东西”(175 页)。与这些环境恶劣、尚未完工的街巷相比，“伦敦街”这样的主干道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消费空间，到处展现了金钱、商品和资本的伟力。在约翰·巴顿的眼中，“两旁的店铺灯烛辉煌”，店铺如“阿拉丁仙果累累的花园”般闪亮，“堆足货物、充满光线的店铺和那间混暗凄凉的地下室正好形成一种对照”(58 页)。都市街道的场景帮助小说人物和读者深刻学习到“关于慈善、宽容甚至政治经济学的课程”。<sup>㉑</sup>工人阶级家庭可悲的生活与居住条件和恩格斯在《1844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做的描述相吻合，<sup>㉒</sup>即存在地理空间上极度的不均衡发展状态。小说对工人戴文保一家居住的地下室周边环境的描述便是一例：遍地窟窿的街道、水沟、水潭、水洼、“死水”、“阴湿的土墙”，以及阴暗而充满臭味的地下室(74-75 页)。

都市街道的第三个意象便是无家可归的都市“行走者”爱丝忒对杰姆所描述的景象：“要是你需要我，那么，晚上到这里附近的街头来寻我。夜晚越是冷，越是凄凉，越是有大风大雨，你就越有把握找得到我。”(146 页)约翰·巴顿经历了类似的城市“地下”世界：“东奔西走的人群里面”，有“被生活逼迫得无法可想”的女孩、有预谋犯案的“罪犯”和“虚心下气的人”(58 页)。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亦能在玛丽的经历中一见端倪“看见过地球仪，还能在地图上找出法兰西和世界各大洲的位置”的玛丽曾在街道上帮助了一位意大利乞儿(43 页，306 页)。更为重要的是，徘徊在城市街道上的女

性开始参与到工厂和政治的男性公共空间中去——尤其表现在妓女和慈善活动这两个极端上。<sup>②</sup>

在小说《玛丽·巴顿》开篇不久，盖斯盖尔就塑造了一群年轻活泼的工厂女工，并非同寻常地将她们描述为工业生产模式的产物：“一群群喜洋洋、闹嚷嚷的姑娘……穿着她们这一类姑娘出门时经常穿的服装……她们能引起路人注意的，只是那种在工人群里惯常见到的聪明伶俐的神情举止”；面对周边小伙子们的奉承，“她们并非怕羞，却是自己很有主意的样子”（5-6页）。这里，年轻、聪颖、独立而又生机勃勃的女工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凸现出工业时代的女性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崭新角色所展现出的群体力量。虽然做工带来的收入和都市的消费主义容易导致女性的物欲堕落，作者在文中就借玛丽的父亲约翰·巴顿之口教训过玛丽，但叙述者显然肯定了女工这群带着独立意志和自信心、“力量和活力”的公共角色。<sup>③</sup>尽管玛丽的姨母爱丝忒私奔之后不幸从先前的工人阶级女性沦为了街头流莺，玛丽和小卡逊先生之间的危险恋情似乎也笼罩在姨母往事的阴影之下，但小说开篇的这组新时代工人阶级女性的素描似乎预示着玛丽未来所具备的坚定、自信、干练和毅力，她也正是凭借这些素质成为一家女式衣帽店的学徒，并勇敢地决定营救杰姆；她的好友玛格里脱（今译玛格丽特）也是凭借这些素质从缝纫女工转变为歌手。

与工人阶级女性活泼甚至有些欢快的工作状态相反，小说里失业的工人阶级男性与悠闲的中产阶级女性在境遇上却颇为相似。<sup>④</sup>这无疑是在哈维所谓“使用价值和具体的劳动”空间的再现。<sup>⑤</sup>倘若工人阶级男性的失业来自于商业和工资上的斗争，那么中产阶级女性的“自私的休闲生活”<sup>⑥</sup>则让我们想起列斐伏尔关于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不同阶级在“休闲”与“工作”上的权利差异。<sup>⑦</sup>男性和女性劳动

的价值和空间上的差异证明了哈维以下的判断：即工人阶级在劳动中深受剥削，而资产阶级则享有“私有财产和阶级特权”，这一切都是工业生产模式中“不均衡发展”的特征。<sup>⑧</sup>在小说描写的曼彻斯特，资产阶级生活富足，工人阶级男性则饱受失业和贫穷的痛苦，难以养家糊口。约翰代表工人阶级谴责了这一不公正的贫富差距：

我们有气力上一天工，就给他们做一天努力；我们流了血汗，他们挣了家业，可是两方面完全隔绝，像两个不同的世界，当真的，好比《圣经》里的财主和乞丐一样，他们中间有着一道跨越不过的鸿沟。（11页）

工人阶级女性的忙碌和中产阶级女性的闲适之间的反差进一步体现出前者在工厂内外所遭受的剥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女性被束缚在家庭空间之中，同样成为中产阶级家庭意识形态的牺牲品。盖斯盖尔就此将性别和阶级结合在资本主义城市生活的不均衡发展当中，而工人阶级在贫民窟的生存状况尤为触目惊心。正是在这样的工业环境下，玛丽·巴顿依靠自己做学徒的微薄工资支撑着父女二人的生活（其父约翰此时已成为罢工工人的领袖）。

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所在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空间之中，玛丽以“行走者”的德塞托式空间方式实践了女性对资本主义空间的消费以及对父权规训的反抗。德塞托分析了普通个体的三种“空间实践”策略，即“行走于城市”、“铁路上的探索”和“空间的故事”。<sup>⑨</sup>这些普通的城市生活呼应了哈维的城市政治和毕格娄浪漫主义的个人消费主义。这些实践主体（比如玛丽）将自己提升为都市的“窥伺者”，城市此时作为“全景式权力”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的“战略”地盘遭到了女性个体的“战术”抵抗。如玛丽这样的女性主体

正是通过对都市道路的个性化选择实践了“行走的言语”。<sup>③</sup>于是城市街道的几何地形经过玛丽的性别活动转化为女性行走者的空间。女性“行走者”通过“空间的故事”和“日常文化里关乎空间的故事”实现“零散”、“缩微”而又“发散”的空间活动，从而在资本主义父权社会的“战略”地盘里将“中间地带转化为女性自身的稳固的地盘”。<sup>④</sup>

### 三、玛丽·巴顿的空间性别活动与无产阶级的整体性救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业化、城市化“产生了一种最最牢不可破的怨结，那便是社会上不同阶级中间存在着的分歧”。(108页)盖斯盖尔和她的人物约翰·巴顿都将这一可怕的情形归咎于资产阶级的漠视和无情。巴顿引用圣经里的富人与穷人的寓言，又向众人叙述伦敦请愿的失败；他抗议工人失业，甚至最终堕落成鸦片吸食者——这一切都佐证了史家汤姆逊如下论断“1830年以来，一个更加清晰定义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正日趋成熟，工人阶级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才能继续新旧意义上的战斗。”<sup>⑤</sup>正是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引导着玛丽接触和介入到劳资间的阶级对抗中来。哈维所论的“都市政治”里的阶级斗争以及工人阶级意识的崛起就此成为这部小说连接性别和阶级话语的潜台词，而工业社会里的阶级对抗亦与情节剧(melodrama)般的爱情故事连接在一处。<sup>⑥</sup>年轻的女主人公玛丽因此必须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之间做出抉择。随着爱情故事转化为跨阶级的命题、个人事务转化为公共事务，玛丽英雄般地介入谋杀案，进而成功激发了自身女性主义的政治能动性和身体政治。尤其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玛丽从最初作为传统的受金钱驱使的消费者逐步演变为相当于工人阶级“代言人”的新角色——客观上并在文学意义上消除了底层人民弗朗肯斯

坦般的怪兽形象，从而开创了卢卡契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因此，众多“消费的空间”<sup>⑦</sup>促使玛丽在阶级鸿沟面前对自己的阶级意识有了惊醒。从“办货”干练、“觉得花钱买东西比邀请客人更有趣味”的13岁的小姑娘(20页)，后来成长为英雄般的个体，带着玛格里脱借给她的钱去利物浦拯救杰姆(352页)。其间，金钱的消费不可或缺，因此玛丽便成了“经济活动的能动主体”。<sup>⑧</sup>玛格里脱作为崭露头角的歌手通过在“约克郡和郎卡郡”等工业城镇的巡游挣得了钱(183页)，并将它借给玛丽，这里的金钱不仅反映了劳动中交换价值的定义，更向玛丽传达了哈维对价值的定义——“花费在社会劳动上的必要时间”。<sup>⑨</sup>玛格里脱给她讲述了杰姆靠工厂里的专利技术挣了“两三百个金镑”以及她自己如何靠唱歌挣钱的经历，教导玛丽，“使她明白了货币的价值，要知道，她手里拿着的那个金镑，虽然给她的安慰力量最小，比起友谊来简直可说毫无价值，但是可以用来买到多少东西呀！”(185-187页)

相比较而言，她的姨母爱丝忒正是因为轻视金钱的价值，私奔后人生日渐困窘，直至沦为街头流浪女。爱丝忒曾这样谈及丈夫当初给自己的50个金镑“可是那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金钱的价值。”(211页)对于玛丽而言，“那个神秘失踪了的姨母爱丝忒所讲的话也在她身上不知不觉发生着一种影响”(32页)，这便预示着玛丽将会像她姨母一样，通过自身体验获得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理解，虽然过程可能完全不同。姨母爱丝忒既是维多利亚小说中典型的“堕落的女性”形象，<sup>⑩</sup>又是玛丽的母亲的替身，<sup>⑪</sup>然而批评家未能看到盖斯盖尔在金钱价值和道德价值两个方面构建了爱丝忒和玛丽之间的对比：爱丝忒本人意识到自己的“堕落”(degradation)(314页)，因此她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要阻止玛丽在金钱和道德方

面的价值“堕落”和“贬值”。<sup>⑩</sup>

小说前半部,因为工厂工作环境不佳,又要避免做帮佣类的粗重活,玛丽选择在女式衣帽店做学徒,而且她“早就认定了她的美貌准会使她成为一个大户人家的太太”(39页),于是幻想着成为“哈利·卡逊太太”之后的灰姑娘传奇,“又跟大户人家的太太一样去做些空洞无聊的漂亮事儿”(102页)。和玛格里脱在金钱上的积极作用相反,玛丽在服装店的同事莎莉·利得比脱则代表了金钱对道德的侵蚀作用。<sup>⑪</sup>在莎莉的帮助下,玛丽和卡逊少爷有了来往,然而等待她的结果却是要么成为另一个爱丝忒般的“堕落的女性”,要么嫁入资产阶级的卡逊家庭,成为又一个被禁闭在家庭空间当中的老卡逊太太。倘若没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玛丽工人阶级意识的培养,便无法想象小说中会有这样的女英雄从老套的情节剧中凤凰涅槃。

不同的“消费空间”所产生的阶级暴力则进一步培育了卢卡契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sup>⑫</sup>年轻的工业资本家小卡逊遭到谋杀,从而启蒙了玛丽身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此转变之前,无产阶级呈现出个体碎片化的形象——既被妖魔化,又处于被剥削的状态,这促使盖斯盖尔夫人在其小说中将工人阶级描述为丑陋的“弗兰肯斯坦”——“一个强大的怪物,但内心无法获得和平和幸福”(150页)。老爱丽丝后来又聋又盲,无力说话,几近瘫痪;玛格里脱本就是个盲女;爱丝忒结果成了醉鬼和沦落街头的妓女;威尔逊夫人也在儿子被抓后几近疯癫。这样的工人阶级意识就此成为卢卡奇所论及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个“环境既是劳动客体在科学而机械地碎片化、专门化了的生产的原因,又是产物,劳动的主体则必然类似地走向合理的碎片化”。<sup>⑬</sup>盖斯盖尔笔下的女性就此被“原子化”和“削减成孤独的微粒”,并沦为“一个异质系统”的牺牲品。阿姆斯特朗曾评论说,《简爱》的怪物型人物波莎·梅森代表了“野蛮的工

人阶级身体内所容纳的桀骜不驯的欲望”。此处盖斯盖尔夫人同样借用玛丽·雪莱所塑造的怪兽意象将工人阶级女性的身体甚至道德的缺陷同碎片化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联系在一起,并置于资产阶级的整体性之下,规训和颠覆的意味并存。<sup>⑭</sup>

为了将碎片化的工人阶级意识重构为一个整体,盖斯盖尔夫人强调了玛丽在谋杀案发生后的成长,尤其她对“地方、阶级和身份的忠诚”可视为一种“再现的空间”。<sup>⑮</sup>在杰姆和卡逊之间,玛丽发现“各种的奢侈排场,一切的赏心乐事都是那样空虚、无聊,除非她能和吉姆一同来享受”(170页)。后来,玛丽认定帮杰姆脱罪是“她首要的责任”(339页),因此努力赢得了玛格丽脱和代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的约伯·李的支持。早已誓言弃绝同小卡逊有任何关联的玛丽确认了自己是织工的女儿、工人的女儿,一门心思地介入到这场象征工业资本主义劳资矛盾的司法案件当中去。她第一个想到要为杰姆找到不在场的证词“没有一个能有她那样的动机;因此也没有一个能有她那样敏锐的头脑和拼死的决心。”(376页)对于阶级、地域和身份的忠诚进一步激发了玛丽有效地掌控住自己的感官,从而理智地为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服务。<sup>⑯</sup>为了拯救劳工女性所代表的破碎的无产阶级意识,盖斯盖尔借助玛丽的空间表征活动重构出完整的工人阶级的整体意识。玛丽追逐的证人名叫“威廉”,其英文名字中的Will暗合“意志”、“意愿”,而玛丽正是一路乘火车、穿街走巷才最终追赶上了那艘和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扩展密切相关的轮船。小说所涉及的水手当中,威廉前往南美洲,斯泰吉斯家的儿子前往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而约翰也在吸食鸦片,<sup>⑰</sup>这些和玛丽相关的细节都代表着哈维意义上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流通以及资本主义的霸权。

玛丽·巴顿在利物浦的经历文学化地展现

了资本在交换价值上的流通,从而为女主人公自身摆脱父权制度的束缚提供了德塞托式的“机遇”与“裂缝”。她借助玛格丽脱资助的金钱,乘坐火车来到利物浦,并在城市的空间探索中搜寻威廉的下落,其间她见识了利物浦的交易所、繁忙的码头(390-391页),并以证人的身份挣了一些小钱(477页)。这一系列的空间探索和角色转换帮助玛丽颠覆了家庭空间内父权对女性的禁锢,甚至让原本重金聘请律师以保证庭审万无一失的老卡逊先生相形见绌。更为重要的是,玛丽在城市和法律公共空间内的探求,实践了哈维所谓的“革命的策略”,与老卡逊代表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甚至她的父亲约翰·巴顿的家长作风针锋相对。在晕倒于法庭上之前,玛丽最后的英雄行为便是她勇敢地告白了对杰姆的爱。这不仅“给杰姆传达了力量”,<sup>⑤</sup>而且赋予她自己以16世纪贝特丽采·钦契的反父权形象,摆脱了老卡逊所诅咒的古希腊海伦式的红颜祸水的罪名。这里的贝特丽采形象涉及“弑父的罪行和牺牲者凛然指责当权者的英勇力量”。<sup>⑥</sup>在法庭的公共法律空间之中,玛丽发现“突然间,她不知道怎么一来,完全清醒了。她感觉到一切都是真实的,几百个人在对着她看,一句句听上去象是真实的话从她口里引出来”,而“她的感觉竟变得非常活泼和灵敏”(437-438页)。玛丽抛弃掉“女性的羞惭”,坚定地向律师陈述了自己对杰姆的爱,“她说得又坚决又清楚,使人没有怀疑的余地”。(438页,440页)她勇敢地直面资产阶级律师的尖刻盘问,最终等来了证人威廉的到来,从而以众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逆转了法庭的最后判决。值得注意的是,从象征的角度说,如同莎翁笔下的鲍西亚一样,玛丽代行了法庭中男性律师的角色。杰姆自己的辩护律师似乎并不擅长和自己的嫌疑人进行沟通,遑论去影响和帮助他了。杰姆拒绝了他的帮助但最终从玛丽的爱情中获得了道德乃至政治力量。杰姆就此成为“未来的工

人”的代表,成为“技术进步真正的源泉,‘现代普罗米修斯’,而非‘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sup>⑦</sup>

事实上,在拯救工人阶级的父亲和爱人的过程之中,玛丽所汲取的活力来源于“她同众多兰开夏郡的劳工妇女共享的不屈不挠的精神”。<sup>⑧</sup>玛丽在城市公共空间和法律空间里的探求一方面赋予她在公共空间内的新的公共身份,<sup>⑨</sup>另一方面更体现了从劳工女性伤残了的“感官”<sup>⑩</sup>到威廉(Will)所象征的阶级“意志”的追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玛丽承担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重任,同时又代表了劳工妇女的形象。<sup>⑪</sup>工人阶级女性的多重“感官”伤残的症候表现了女性劳动力所受的剥削以及破碎的工人阶级意识,直到玛丽将这些碎片化的“感官”重聚为工人阶级的集体“意志”,同时救赎了破碎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无意识”。

#### 四、盖斯盖尔的政治妥协与“空间操控”

如果说老爱丽丝这样的维多利亚工人阶级女性无法获得政治能动性的话,玛丽作为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女性代表以其在城市公共空间里的性别活动勇敢地拒绝了两种宿命:或者如卡逊家的那些中产阶级女性那样受困在家庭空间之内,或者如底层女性爱丝忒那样流浪、醉宿于大街上。玛丽以其英雄般的行为帮助无产阶级重构其准阶级意识,并将迪斯累利所谓“两个国度”的分裂重构为盖斯盖尔夫人所倡导的基督教式的兄弟情谊或者“家族主义的理想”。<sup>⑫</sup>然而,随着玛丽最终嫁给杰姆,她从工业革命中所获得的女性主义能动性最终让位给了家庭空间和男权世界。当玛丽代表杰姆通过寻求证人和法庭辩护从而使自己的性别活动达到最高潮之际,<sup>⑬</sup>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此从女性交回到男性手中。之后,约翰·巴顿的回归、劳资双方的圆桌会谈(即老卡逊、杰姆

与约伯的约谈,也代表父权与资本之间的共谋)以及玛丽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到“谵妄而解体的意识”的堕落<sup>⑨</sup>——这三者标志着之前女英雄一般的玛丽不得不以女性主义的政治能动性来换取作为女性的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重生,她要接纳的只能是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式的伴侣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玛丽站在面对城镇的家屋门口,守望着她的丈夫散工回来;她一面看着,一面微笑地在听着。”(531页)至此,盖斯盖尔的政治妥协不言而喻。

尽管伴侣婚姻当中的杰姆自会感激玛丽的能力和智慧,但后者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空间探求的经历必定为无声而规范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所取代。<sup>⑩</sup>作为婚姻市场中商品的希腊的海伦,弗兰肯斯坦的破碎的意象,以及激进的政治想象下的贝特丽采——所有这些都妥协成为经过改造了的“屋里的天使”。玛丽最终移民到加拿大、安心做家庭主妇的结局,借用哈维的理论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文学空间上的“空间操控”(spatial fixes),<sup>⑪</sup>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女性内在的意识形态矛盾提供一种可能。批评家普遍将玛丽回归家庭空间归咎为盖斯盖尔夫人“幼稚或粗心地从激进政治退化到温馨的罗曼史”。<sup>⑫</sup>藉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之间似乎可以获得理想状态的斡旋,但也有论者称玛丽将成为“第二个卡逊夫人”,<sup>⑬</sup>这一说法忽略了玛丽经过空间探求之后已经远比老卡逊夫人得到更加平等和富有自尊的家庭甚至社会地位,因而更符合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式的伴侣婚姻的理想模式。然而,盖斯盖尔的政治妥协终究以“空间操控”的乌托邦话语得以实践,从而也预示着代表家族主义、“经过改造的资本家卡逊”必将同代表着新一代资本家的杰姆发生冲突。<sup>⑭</sup>在盖斯盖尔夫人看来,解决这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融合资本、性别和文化三重要素的政治解决方案就是:在小说的文本空间之外,将北美那片新世

界想象为“自由无羁的空间”。<sup>⑮</sup>

#### 注释:

- ① Mary Poovey, *Making a Social Body: British Cultural Formation: 1830 - 186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25.
- ② 学界普遍认定的此类小说还包括盖斯盖尔的《北方与南方》(*North and South*, 1855)、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 1854)、查尔斯·金斯利的《艾顿·洛克》(*Alton Locke*, 1850)、本杰明·迪斯累利的《西比尔》(*Sybil*, 1845)、爱略特的《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 1866)等。参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87页; Kathleen Tillotson, *Novels of the Eighteen-Fort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18 - 123页; Catherine Gallagher, *The Industrial Reformation of English Fiction: Social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Form 1832 - 186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xi页; Joseph W. Childers, "Industrial Culture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77 - 78页; Josephine M. Guy, *The Victorian Social-Problem Novel: The Market, the Individual and Communal Life*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3页。
- ③ 这种二重空间的分化缘自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度的妥协,尽管工人阶级妇女大多成为资本主义劳动力,但占据资产阶级文化统治地位的“家庭意识形态”(domestic ideology)将中产阶级妇女尤其上层女性禁锢在家庭空间内,以至成为1854年诗人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所称颂的“屋里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维多利亚学者对这种习惯上的二分法看法不一,多数持赞同态度,笔者在本文中按照主流观点认可女性面对此二重空间的客观现实性。
- ④ 参见 Alison Chapman ed., *Elizabeth Gaskell: Mary Barton, North and South* (Cambridge: Icon Books, 1999)。
- ⑤ Elizabeth Kowaleski-Wallace, *Consuming Subjects: Women, Shopping, and Busi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8.
- ⑥ Gordon Bigelow, *Fiction, Famine,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and Ire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
- ⑦ Gordon Bigelow, *Fiction, Famine,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and Ireland*, p. 63.



- ⑧ Gordon Bigelow, *Fiction, Famine,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and Ireland*, p. 72, p. 74.
- ⑨ Davi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 p. 143.
- ⑩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F.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36–37.
- ⑪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 xix, p. 36;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5), p. 209.
- ⑫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p. 209.
- ⑬ 马克思 《英国资产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686页。
- ⑭ Josephine M. Guy, *The Victorian Social-Problem Novel*, p. 4, p. 10.
- ⑮ 引自 Harriet Guest, “The Deep Romance of Manchester: Gaskell’s ‘Mary Barton’”, in *The Regional Novel in Britain and Ireland, 1800–1990*, ed. K. D. Sn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0页。
- ⑯ Deirdre D’Albertis, *Dissembling Fictions: Elizabeth Gaskell and the Victorian Social Text* (New York: St. Martin’s, 1997), p. 46.
- ⑰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51.
- ⑱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p. 196.
- ⑲ 布里格斯认为：维多利亚早中期的曼彻斯特成为了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和“进步的辉煌代表”，而它的“进步”就体现在新颖的建筑和环境的肮脏上。参见 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88, 89页。
- ⑳ 伊丽莎白·盖斯盖尔 《玛丽·巴顿》，荀枚、余贵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16页。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 ㉑ Deirdre D’Albertis, *Dissembling Fictions*, p. 54.
- ㉒ 参见 Mary Poovey, “Disraeli, Gaskell, and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ed. John Richetti,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521–522页。论者注意到恩格斯和盖斯盖尔在这一方面的描述的相似性，参见 Joseph W. Childers, *Novel Possibilities: Fi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Victorian Cultu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158页。但也有些论者试图区分小说和恩格斯作品之间的差异，参见 Deborah Epstein Nord, *Walking the Victorian Streets: Women,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C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7页；Susan Zlotnick, *Women, Writing,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78页；John Lucas, *The Literature of Change: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incial Novel* (New Jersey, Barnes & Noble, 1980), 54–55页。
- ㉓ Deirdre D’Albertis, *Dissembling Fictions*, p. 47.
- ㉔ Robin B. Colby, “Some Appointed Work to Do”: *Women and Vocation in the Fiction of Elizabeth Gaskell* (Westport: Greenwood, 1995), p. 36.
- ㉕ 参见 Susan Zlotnick, *Women, Writing,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57, 75页；另参见 Robin B Colby, “Some Appointed Work to Do”, 34–46页，但二人均未论及城市和工业的空间。
- ㉖ Davi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p. 143.
- ㉗ Robin B. Colby, “Some Appointed Work to Do”, p. 39.
- ㉘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I,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1991), p. 29.
- ㉙ Davi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p. 143.
- ㉚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 91, p. 111, p. 115.
- ㉛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p. 97–100.
- ㉜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 115, pp. 118–127.
- ㉝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1963), p. 712.
- ㉞ 以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为代表的大多数批评家都将巴顿父女二人的两条故事主线之间的脱节之嫌归于小说的情节剧叙事，但诺德 (Deborah Epstein Nord) 则提到了玛丽的公共角色与女性主义的能动性 “盖斯盖尔重写了性别上的情节，在各个结点上都和阶级对抗密切相关。”参见 Deborah Epstein Nord, *Walking the Victorian Streets*, 149–150页。
- ㉟ Davi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p. 143.
- ㊱ Josephine M. Guy, *The Victorian Social-Problem Novel*, pp. 152–158.
- ㊲ Davi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p. 143.
- ㊳ 参见 Deirdre D’Albertis, *Dissembling Fictions*, 48–58页；Deborah Epstein Nord, *Walking the Victorian Streets*, 151–152页。
- ㊴ 参见 Patsy Stoneman, *Elizabeth Gaskell* (Sussex: Harvester,

- 1987) , 79 页; Jennifer Uglow , *Elizabeth Gaskell: A Habit of Stories*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 1993) , 207 - 209 页。
- ④⑩ Hilary M. Schor , *Scheherezade in the Marketplace: Elizabeth Gaskell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p. 40.
- ④⑪ 在玛格里脱和莎莉的影响下, 玛丽“开始懂得金钱的可贵, 它能‘买命’”( 150 页)。然而最终, 玛丽抛弃了 18 世纪消费主义的根基, 参见 Harriet Guest, “The Deep Romance of Manchester: Gaskell’s ‘Mary Barton’” , 95 页。博顿海姆则认为“玛格里脱和莎莉代表了玛丽的好天使和坏天使”, 参见 Rosemarie Bodenheimer, “Private Grief and Public Acts in *Mary Barton*” , in *Mary Barto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Criticism* , ed. Thomas Recchio ( New York: Norton , 2008) , 524 页。
- ④⑫ Georg Lukács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 trans. Thomas Recchio ( Cambridge: MIT , 1971) , p. 52.
- ④⑬ Georg Lukács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 p. 90.
- ④⑭ Georg Lukács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 p. 90.
- ④⑮ Nancy Armstrong, “Gender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 ed. Deirdre Davi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p. 112.
- ④⑯ 小说对工人阶级男性亦有类似的描述, 比如约翰·巴顿通过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的感知。关于怪物形象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其他角度的探讨, 参见 Deirdre D’ Albertis , *Dissembling Fictions* , 55 页; Patsy Stoneman , *Elizabeth Gaskell* , 73 - 74 页; Deirdre David , *Fictions of Resolution in Three Victorian Novels: North and South, Our Mutual Friend, Daniel Deronda*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1) , 31 , 43 页。
- ④⑰ David Harvey ,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 p. 143.
- ④⑱ 凯尔达指出玛丽深感罪恶, 因为与老板们交往代表着背叛阶级利益, 参见 Jenni Calder , *Women and Marriage in Victorian Fiction*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6) , 71 页。小说中玛丽在乘火车前往利物浦时, “对故土的眷恋”之情油然而起 ( 380 页) , 从而凸显她对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忠诚。
- ④⑲ Liam Corley, “The Imperial Addiction of *Mary Barton*” , in *Mary Barto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Criticism* , ed. Thomas Recchio ( New York: Norton , 2008) , p. 631.
- ⑤⑩ Robin B. Colby , *Some Appointed Work to Do* , p. 43.
- ⑤⑪ Deborah Epstein Nord , *Walking the Victorian Streets* , p. 156.
- ⑤⑫ Patsy Stoneman , *Elizabeth Gaskell* , p. 84.
- ⑤⑬ Enid L. Duthie , *The Themes of Elizabeth Gaskell* ( Totow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1980) , p. 69.
- ⑤⑭ 参见 Rosemarie Bodenheimer, “Private Grief and Public Acts in *Mary Barton*” , p. 525; Constance D. Harsh , *Subversive Heroines: Feminist Resolutions of Social Crisis in the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4) , p. 100.
- ⑤⑮ Jill L. Matus, “*Mary Barton* and *North and South*” ,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lizabeth Gaskell* , ed. Jill L. Matu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 p. 31.
- ⑤⑯ Robin B. Colby , *Some Appointed Work to Do* , p. 45.
- ⑤⑰ 参见 E. Holly Pike , *Family and Society in the Works of Elizabeth Gaskell* ( New York: Peter Lang , 1995) , 25 页; Patsy Stoneman , *Elizabeth Gaskell* , 83 , 119 页。
- ⑤⑱ Robin B. Colby , *Some Appointed Work to Do* , p. 44.
- ⑤⑲ Deborah Epstein Nord , *Walking the Victorian Streets* , p. 156.
- ⑥⑩ Susan Zlotnick , *Women, Writing,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p. 86.
- ⑥⑪ 此术语意指“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地理扩张的方式所做的外在转型”, 马克思认为这一资本主义殖民化历程注定要失败, 因而不过是资本主义“在其他空间里的乌托邦解决方案”而已, 参见 David Harvey ,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 New York: Routledge , 2001) , 288 , 306 , 311 页。
- ⑥⑫ Patsy Stoneman , *Elizabeth Gaskell* , 85 页, 类似说法可参见 Deborah Epstein Nord , *Walking the Victorian Streets* , 157 页; Rosemarie Bodenheimer, “Private Grief and Public Acts in *Mary Barton*” , 528 页。
- ⑥⑬ Susan Zlotnick , *Women, Writing,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pp. 86 - 87.
- ⑥⑭ Patsy Stoneman , *Elizabeth Gaskell* , p. 119.
- ⑥⑮ Hilary M. Schor , *Scheherezade in the Marketplace* , p. 37.

( 作者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 何 卫

believe that any attempt to rebuild will cause them to fall back into the “trap” of metaphysics. Nowadays , many writers , literary scholars and critics are beginning to wonder whether the poststructuralist way of thinking and its analytical methods can still be applie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y try to find new methodologies , open up new territory in the fields that poststructuralists abandoned , and infuse new spiritual content into old materials. A focal point of their work is the study of new concepts of corporeality and centering.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the ostensive sign developed by American cultural theorist Eric Gans. It will also apply these theories to new modes of gender construction in selected European fiction since the late 1990s and explain why a post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se novels.

### **Two Master Dramatists: In Memory of Marcel Pagnol and Sacha Guitry**

**ZHU Xiaojie**

In the 1930s , the birth of sound film ushered in a new age of the marriage between drama and film and a golden age of French cinema as well. Marcel Pagnol and Sacha Guitry , two famous dramatists , created classic pieces in the history of films with their profound stage experiences and innovative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and were widely acclaimed as two master dramatists. The present paper , in a chronological order ,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two dramatists with regard to their experience of making films , film language , chronological and spatial factors and style of their works , analyse their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film art , and finally reflect 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ramatized film”. The year 2015 is the 12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Pagnol and the 130th of Guitry. The paper is therefore an tribute paid to the two masters.

### **Feminist Spatial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of Gaskell’s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Mary Barton**

**FAN Yiting**

Gaskell , among other early and mid-Victorian novelists , addresses women’s access to industrial , urban and legal spaces to mediate class conflicts and economic struggles. By focusing on body politics and feminist agency of Mary Barton , the titular heroine of the novel , this paper seeks to study the novel by way of Marxist space analysis. With such spatial adventures in the public sphere , the heroine not only transforms herself from an individual consumer to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proletarian class consciousness , but represents the novelist’s gendered 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a Lukácsian recuperation of proletarian image as a whole.

### **Appropriation and Transvaluation: Proba’s Cento from Virgil**

**GAO Fengfeng**

The cento composed by Proba in the 4th century is a patchwork consisting exclusively of lines and half-lines taken from Virgilian corpus , and it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Genesis and gospel narratives. The paper begins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f cento as an ancient literary genre , focusing on its salient features